



【礼贤下士，寻找翻译家】

◆ 1977年，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。那些年，王智量正“忙”着修防空洞、在街道小厂搬钢板、在黄浦江边扛木头，旁人眼中不过一个靠股子力气养家的临时工，但刘佛年清楚，他找的人正是北大第一届俄语专业毕业生，20余年坚持翻译普希金名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翻译家。

【恩师如父，大概也就如此了】

◆ 每次上完课，刘佛年都要送学生下楼，还要问接着去哪里。有一次，顾泠沅告诉老师，他要去一下学校教科院办公室。谁料刚到教科院不久，就下起了大雨。然后，顾泠沅便看到年逾七旬的老师一手拿了一双雨鞋，一手拿了把雨伞，走进了办公室。他特意跑来给学生送雨具，恩师如父，大概也就如此了。

【几乎每本外文书物都有他借书的记录】

◆ 围绕教育管理实践和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，刘佛年从未放弃教育理论研究工作，是社会主义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杰出代表。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曾回忆：“有一次我到华东师大教育系查资料，发现几乎每本外文书物后面都有他借书的记录，他勤奋读书的精神，令人钦佩不已。”

# 刘佛年：奠定教育学教材编写基本框架与原则

■ 本报记者 刘迪

他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的编撰者，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任校长暨改革开放后的首任校长，他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人，他是刘佛年——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家，改革开放后融汇贯通中西方教育理论以推进教育实践创新的旗手。

## 一座校园，半个世纪

1914年4月，刘佛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（今醴陵市）大林乡一个书香门第，排行“年”字，因父亲潜心佛学，故名“佛年”。其父刘约真，宣统元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，参加过同盟会和柳亚子等发起的进步文学社团“南社”活动。辛亥革命后，参与创办《长沙日报》。刘佛年4岁丧母，6岁起在本乡国民小学就读。两年后，到醴陵县城醴泉小学读书。后转至长沙完成小学学业。其间，随父习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书。1925年，刘佛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——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学校。创办人胡元僊“因决志以教育救国、培养中级社会人才、复兴民族为己任”，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曾执教于此。

四年后，刘佛年考入武汉大学预科。两年的预科学习期间，他埋头于《左传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及韩文、杜诗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，并开始阅读柏拉图、休谟、卢梭等哲学家之著述。1931年，刘佛年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修读本科，系统地学习了洛克、贝克莱、康德、黑格尔、老子、庄子等东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，并研修杜威的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、盖茨的《教育概论》、坎德尔的《比较教育学》，以及桑戴克、柯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。

大学毕业后，刘佛年考入广州学海书院，得院长张君勱指导，继续研究黑格尔及中国古代辩证法。1937年10月，他负笈英伦，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、剑桥大学，专攻哲学。而后转学法国巴黎大学，研究中国古代辩证法。1940年暑假，再赴德国柏林作短期教育考察，因时局动荡，取道回国，在德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刘佛年来到上海，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，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。次年秋，他受聘于暨南大学，主讲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。哲学概论的课堂上，他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类别来讲授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，并围绕社会和教育问题，开展学术研究，撰写了《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识》《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》《唯物论与教育》等文章，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上海解放，刘佛年以满腔的热忱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，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。同年8月，暨南大学停办，刘佛年任上海师范学院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、上海教育工会主席。

1951年春，他参与筹建华东师范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华东师大”），任常务委员，后任华东师大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。自此，直至2001年去世，刘佛年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工作与生活了整整50个年头。

1956年，刘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一年后，任华东师大副校长兼教务长。1978年8月，刘佛年被任命为华东师大校长。

教学上，刘佛年主张文理渗透，培养复合型人才。学校探索通识教育，在部分系试行文科学理、理科科学文，先在78级文科生中开设高等数学、自然发展史等理科课程，后又在理科一些系开设大学语文、写



## 【学术档案】

刘佛年(1914—2001)，教育家。湖南醴陵人。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。1937年出国留学，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、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。1940年初回国，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、国立师范学院(校址设于湖南)、暨南大学教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上海师范学院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教务长、副校长、校长、名誉校长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、二届学科组教育组成员，中国教育学会第一、二届副会长，上海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，《辞海》副主编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教育卷》编委、副主任。曾当选第五、六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毕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。主要著作有《罗素论》(著译)、《教育学》(主编)、《刘佛年教育文选》等。

作等文科课程。科研上，刘佛年提出抓紧重点建设学科的主张，确定一批高水平、有特色的重点学科，以带动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。1984年，任华东师大名誉校长。

## 为1960年代教育学科学发展注入了新声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为了改善我国文科教材长期落后的局面，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下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批中坚学术力量，着手编写包括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“中国化”教材。

当时学界开始反思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，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判，同时诸多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教育思想与意见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。于是，教育学便成为了整个文科教材编写的重点部分。当时，文科教材编写的主编大都已经选定，唯独教育学的编者尚未敲定。1961年2月19日，周扬在上海召开的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，最终提议请刘佛年主编《教育学》。

这对于早年便打算在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深耕下去的刘佛年来说，完全是始料不及的。况且要求其半年内完成教材编写工作，以解国内教育学教材空白的燃眉之急，刘佛年当即表示如果不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，空发议论，恐怕难以服众。而周扬的答复很明确：“先编出一本来，教材总是先‘有’后‘好’，以后教材还可以换。现在编的教材字数不要太多，是纲要式的。”

在这种“只争朝夕”的氛围之下，刘佛年着手主持《教育学》的编写工作。为此，华东师大同意刘佛年脱离行政工作，全力以赴做好教材编写工作，并抽调教育学的教学、科研骨干教师组成编写班子，编写组进驻封闭作业，以专心编写工作。为了摆脱“政策资料汇编”的传统窠臼，刘佛年与编写组将教育学教材定位于既遵循或不违背现行教育政策，又使教育理论的陈述与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使其接近教育的专业研究。基于这一定位，他意识到《教育学》的编写工作一定要打破既定的框框，直面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。而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：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与其他基础学科的关系问题；教育学的理论性质；教育学问题域及其研究对象；教育学研究方法。

受命后不满半年的时间里，刘佛年领衔的《教育学讲授提纲》便告完成。翌年，讨论稿亦撰写完毕。新中国第一本《教育学》由上

册、下册与附录三部分组成。上册涵盖了“教育与政治、经济的关系”“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”“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”“学校教育制度”等7个章节；下册包括“思想教育的意义、任务与内容”“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法”等7章；而附录则对教育与经济发展(1979年版增补)、电化教育(1979年版增补)、美育等内容进行了介绍。教材完成初稿后于1962—1964年四次内部印刷使用，每次付印前均有修改。1978年，应教学需要内部重印了这部《教育学》，并于1979年正式出版，署名“上海师范大学《教育学》编写组”。

这部成书于1963年的《教育学》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科书，它改变了我国沿用甚至照搬西方教育学教材的局面，重新推翻了凯洛夫在苏联版《教育学》中所形成的框架以及长期以来国内教育界“政策汇编”式的习惯，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与原则。

## “群贤毕至”，自然“桃李芬芳”

1977年，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。那些年，王智量正“忙”着修防空洞、在街道小厂搬钢板、在黄浦江边扛木头，旁人眼中不过一个靠股子力气养家的临时工，但刘佛年清楚，他找的人正是北大第一届俄语专业毕业生，20余年坚持翻译普希金名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翻译家。

校长找上门时，王智量一家的境遇堪称“拮据”。“当时我们家穷得不得了，连床都卖掉了，一家五口人都睡在地上，那天我先是看到一双腿，然后才看到一个人走进来了。”早年接受《文汇报》采访时，王智量如是说。刘佛年邀请王智量去华东师大任教，所有手续都由其亲自督办，并给了对方三个选择：一是去中文系任教，二是去外语系任教，三是去他自己所在的教育系，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。王智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系，从

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。理由很简单，他说：“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刘佛年校长。”

“群贤毕至”，然后自然“桃李芬芳”。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用华东师大历史系一位教授的话来说，“这一届华东师大的学生，可谓精英荟萃”，“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，如中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，西方哲学史专家董世俊，国际问题专家、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，等等”。为何“人才”如此“济济”？当年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恰是刘佛年。据说，当时招生的时候，华东师大比其他学校早到半个小时。于是，上海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，当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之中，被抢到了华东师大的并不占少数。

2011年夏，数学家郑伟安彻底辞去供职20年的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职，全职回到母校华东师大任职。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，郑伟安从房修队的小木匠成为数学家的故事，在上世纪7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。

当年，对于未通过统一考试、提前破格录取郑伟安为研究生，华东师大校内外亦不乏“不符合规章制度”的反对声音。校长刘佛年从早出人才、出好人才的大局出发，毅然批准了数学系的报告，迅速安排郑伟安进行考试，及格即吸收他进校当研究生。1978年春节过后，郑伟安便来到了华东师大报到。据说，当时苏步青在复旦招收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，郑伟安的名字亦在候选名单之中，怎料又被刘佛年抢了先。

如果说此间“校长的机智”仅为传闻，其大师眼光与睿智却也真真实实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。后来，郑伟安提前毕业，学校又送他到法国留学。1998年底，刘佛年曾在《文汇报》撰文称，相信郑伟安在有创造性的教师指点下，很快就能成为有独创性的人

## 教育理论要分清 哪些是源 哪些是流

明源头辨流变，是刘佛年指导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。他常说，教育理论体系庞杂、流派纷呈，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源，哪些是流，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，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等等，只有这样，才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。

刘佛年说，从国际看到国内，从旧社会看到新中国，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，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，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它们的流变而已。接受式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，进行单纯的技术技巧的训练，但不利于学生的独创学习。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精神，获得出自需要和目的的技术技巧，但不利于学生系统的知识。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，一直到苏联的凯洛夫，后者的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，两个不同的源头。教育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。

往往只能热闹一阵，开了花不结果，有人说叫‘过眼云烟’。于是，新来的教师只好从头摸起。这是多大的浪费，多么可惜。破解这一困境，办法是什么？一是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中小学去，二是中小学教师都能做些教学研究工作。”

1986年，教育部要培养一线教育家，提议顾泠沅去师范大学硕博连读。刘佛年领衔一个导师组授课，自此结下师生情缘。

上海的冬天冷起来也足以让人心慌，刘佛年家里有一个很“髒”的火盆，于是他家就成了教室。刘佛年家在楼上，每次讲完课，他都要送学生下楼，挡也挡不住。送下楼还要问接着去哪里。有一次，顾泠沅告诉老师，他要去一下学校教科院办公室。谁料刚到教科院不久，就下起了大雨。然后，顾泠沅便看到年逾七旬的老师一手拿了一双雨鞋，一手拿了把雨伞，走进了办公室。他特意跑来给学生送雨具，恩师如父，大概也就如此了。

教育学的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小学，生根于活生生的课堂。破除教育理论与中小学教育之间那道人为的鸿沟，刘佛年力主研究人员要深入实际，花大力气穿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屏障。为了推进基础教育教学实验，总结教育学的规律，他带头身体力行，古稀之年还曾先后五次来到当时顾泠沅工作的青浦县，不仅听介绍，还下学校、进课堂，找教师、学生谈话，然后给予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指导。他指出，我国在教育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，许多学科还只能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。要出自己的成果，理论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，大力加强应用研究。

明源头辨流变，是刘佛年指导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。他常说，教育理论体系庞杂、流派纷呈，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源，哪些是流，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，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等等，只有这样，才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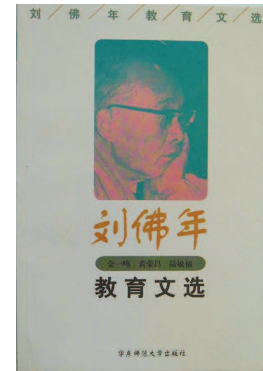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从国际看到国内，从旧社会看到新中国，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，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，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它们的流变而已。接受式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，进行单纯的技术技巧的训练，但不利于学生的独创学习。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精神，获得出自需要和目的的的技术技巧，但不利于学生系统的知识。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，一直到苏联的凯洛夫，后者的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，两个不同的源头。教育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。两种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的流变，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接近和吸收的趋势——真理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。

刘佛年曾说，目前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就创造性教育来说还远远不够。“我们上课强调教师讲，国外教师讲的不多，重点在讨论。学生自己看资料，独立思考，畅所欲言。而我们搞一个学术讨论，总是预先指定一个人，准备中心发言，而后大家围绕中心发言讨论。要创造，就不能太受约束，有太多的框框。创造应有创造的气氛。我带研究生，观念上如有不同看法，我们就争一争，我不勉强他们非要接受我的观念不可。只要他们有道理，大胆思考，我就支持。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思维的大海里纵横驰骋，自由畅想，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，提高他们的创造能力。”

## 刘佛年代表作一览



《教育学》



《刘佛年教育文选》



《罗素论》